

戰前「中間層」日本女性的「越境」與「界線」

以高橋鏡子與尾崎孝子為例

顏 杏如 (YEN Hsin-Ju) *

我的研究與關心

十九、二十世紀的台灣社會，被捲入日本帝國擴張的浪濤，出現了什麼樣的人與物之移動、越境，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社會文化變貌，是我一直以來的研究關心與主題。我的博士論文以日本人居住人口比例最高的台北為範圍，探討在帝國日本與殖民地台灣兩個引力相互影響下，移動至臺灣的日本人具有的群體特質、時代心理，在「空間」和「時間」上的移植——包含有形及無形的空間感知、景觀、時間秩序，以及其對殖民地臺灣社會產生的影響。

這個研究關心的初始，一方面是回應過去臺灣史研究主要以臺灣人為主要對象所產生的缺落，嘗試將在台日人及其活動納入臺灣這塊土地歷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則是面對過去殖民地研究「支配—被支配」的主旋律，嘗試從移動者、離鄉者、殖民地居住者等更複雜多樣的角度的角度，理解在臺日本人的時代心理，及其與殖民地之間的相互關係。

不過，在這樣的研究關心下，儘管描繪在臺日身具複數、多樣的性質，群體內部的差異性卻是無法一一處理的問題。於是，我開始嘗試處理「中間層」日本女性的移動與殖民地經驗。

相對過去被研究者注意到的社會上層的官夫人，或社會底層的賣春婦，殖民地存在許多既非上層，也非下層的女性，她們與帝國、殖民地之間的關係為何？在這個工作坊，我希望藉由目前已完成的兩位中間層日本女性的個案研究，¹圍繞著「越境」與「界線」進行若干比較與討論。

關於高橋鏡子與尾崎孝子

首先，簡單對這兩位女性的生平與經歷作一說明。高橋鏡子，1884年生於士族之家，1924年與丈夫移居臺灣，任職於臺北州海山郡板橋小學校，1932年返日，共居臺八年。鏡子在移動至臺灣之前，曾於1920年與丈夫共赴內蒙古，任職於蒙古產業公司，在興安嶺下大巴林旗大板上開辦學堂。1932年返日後，在東京的滿蒙學校設立女子部，更於1935年前往滿洲，任職於哈爾濱學院。著有《寄自蒙古內陸》(1922)、《映在女性眼中的蓬萊之島》(1933)《女性踏破的滿蒙》(1933)、《感激的回憶》(1942)等書。在移動經歷上相當特殊，亦留下不少著作，記述其蒙古及臺灣經驗。

尾崎孝子，1897年生於商人之家，婚後第三年的1920年渡臺，直至1927年，因丈夫患肺結核而偕夫返日療養，共居台七年餘。在臺期間，致力於短歌的學習與創作，1926年，出版第一本歌集《合歡之花》，1928年短暫渡臺期間完成、出版第一本散文集《美麗的背景》。返日後，擔任《歌壇新報》、《新日光》等短歌雜誌的記者，亦曾於戰後1950-1954擔任逗子町會議員，並持續短歌創作，留下數本歌集，1970年逝於鎌倉。

鏡子與孝子出生的年代相差十三年，舊士族與商家出身，以及因此衍生的學歷、文化資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博士。

¹ 顏杏如，〈與帝國的脚步俱進—高橋鏡子的跨界、外地經驗與國家意識〉，《臺大歷史學報》第52期，2013，頁251-302。顏杏如，〈歌人尾崎孝子的移動與殖民地經驗—在新女性思潮航向夢想的「中間層」〉，《臺灣史研究》，預計刊於2016年6月，第23卷第2期。

本等差異，都隱隱牽動日後向外移動的動機與殖民地經驗之迥異。另一方面，她們也存在著一些共通性：跨界移動都始於 1920 年，兩者皆屬於「中間層」的女性，丈夫都擔任殖民地官僚體系下級官吏以下的雇員。若追探他們向外移動的動機與殖民地經驗，可以看到中間層女性與帝國、殖民地之間的多重關係，以及多重的界線及其變動。

越境的背後

<內在的精神意識>

1920 年，是高橋鏡子前往內蒙古，尾崎孝子前往臺灣的年代。同樣向日本帝國的勢力圈移動，卻是基於相當不同的內在精神構造與意識。

高橋夫婦前往內蒙古，是受到蒙古產業公司總辦薄益三的邀請，二人以蒙古產業公司社員的身分前往。移動的背後，存在著擔任軍職的丈夫面臨軍縮、其他工作亦不順遂等經濟上的因素，以及日本意欲以經濟手段鞏固在東本、內蒙古的勢力等外在時代背景所交織的推力與吸力。但就鏡子而言，他如何思考、看待前往蒙古的意義？

1942 年出版的《感激的回憶》中，鏡子追憶當丈夫壯吉與她商談蒙古之行時，她想起就讀山形市立高等女學校時代（1900 年左右）地理老師的一番話「日本的殖民地總是娘子軍先行渡航前往，所以殖民政策才會失敗。必須讓有教養的女子幫助男子不斷地渡航前往海外才行。」²這番話成為她毅然前往蒙古的精神支柱與推力。

日本帝國主義達到高峰的 20 世紀初，官方確立女子教育之方針為賢妻良母主義，同時，也有一些論述要求女性在對外的帝國經營上扮演一定的角色。報章輿論鼓勵「篤實的」、能夠在殖民地結婚成家的女性向外移動。地理教師的發言正與此般鼓舞前往殖民地開拓的時代潮流重疊，鏡子無疑地承襲此一精神。這也是她於 1924 年向臺灣、1935 年向滿洲移動的基本精神構造。這樣的意識亦表現在她的文章、著作中，並隨著其移動與外地經驗更加深化、發展，自身也成為鼓吹女性向外開拓的一員。可以說，生於士族之家的鏡子，在向外移動的精神構造上，深受官方女子教育及當時輿論對女性角色期待的影響。

相對於鏡子，尾崎孝子的移動則呈顯出相當迥異的動機與情境。孝子向殖民地的移動並非迫於生計，也非因發展不順遂而向外移動，相反地，其移動始於生活最為穩定之時。在渡台動機的自我陳述中，對於自己仍停留在追求生活溫飽的層次感到不滿，由於喜愛文學，想要從事創作，為了充實自我、豐富體驗，選擇航向殖民地。

追求自我、實現夢想，可以說是孝子向殖民地移動的精神構造。起源於熱愛文學的自我追求，則可以追溯至其幼少時期，1910 年代新女性思潮的出現，以及少女雜誌的流行。生於商家的孝子，十五歲高等小學校畢業後未繼續進入高等女學校，因此不在以賢妻良母主義為方針的女子教育影響的範圍內，未透過學校接受「輔佐男性、向外開拓」的意識形態。然而，透過大眾媒體，熱衷閱讀「新女性」們的文學作品，以及流行於女學生之間的少女雜誌，與新女性的思潮和女學生間掀起的文學熱產生交集。

孝子的移動與鏡子互為對照。不同於鏡子，孝子最初的跨界經驗，並非隨丈夫而行，而是先行於丈夫，此外，國家並不在孝子向外移動的視野中，自我的追求才是跨越地理疆界的動力，而連結自我追求的文學夢，則是在當時流通的大眾媒體中萌芽。

² 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東京：乙守玉緒，1942；大空社 1992 復刻），頁 44-45、253。

＜性別界線與跨界＞

在鏡子與孝子的移動過程中，可以窺見性別的界線，以及界線的鬆動。以鏡子為例，移動的契機，是以丈夫的不順遂為起點，而非自主的追求與願望；移動的路徑仰賴丈夫與兄長的人際網絡；移動內在的精神意識，則是在「賢妻良母」的框架中展開，女性的殖民地開拓，被定位在「輔佐男性」的位置上。

然而，在臺灣的八年，鏡子除了擔任小學校的教師之外，還積極參與臺北婦人修養會，並屢屢投書媒體，強調國家觀念的培養，以及女子教育的重要性。1930年，更推動女子高等學院的設置。在這些過程中，鏡子逐漸築起自身的人脈網絡，走入公領域的國家、社會，已不再是賢妻良母方針下安居於家的角色。在投書中顯現的國家意識與教育觀，也逐漸超越賢妻良母主義，發展出自己的詮釋，基於自身的蒙古經驗，強調女性的移動在國家發展上扮演的角色。1935年渡航滿洲之時，仰賴的是自己在臺灣築起的人際資源，並為丈夫在滿洲謀得一職。在性別秩序上，已從蒙古、臺灣渡航時的「從夫、從兄」，轉變為「夫從」了。而尾崎孝子，自移動的初始，就是打破「賢妻良母」框架，改變性別秩序的過程。

社會階層的越境與界線

＜學歷與社會階層＞

鏡子和孝子的「越境」，並不只是地理疆界和性別界限的移動，還牽涉了社會階層的流動。然而，舊士族出身的鏡子和商家出身的孝子，卻呈顯相當不同的軌跡。

明治維新以後，武士階級解體，未擁有家業的舊士族傾向透過學校教育達成社會階層的維持與上升。在此背景下，舊士族家庭出身的鏡子通過教員檢定、接受女子高等教育，這些使其在婚前具有經濟能力，選擇婚嫁時擁有文化資本，移動至外地時成為擁有相當待遇與社會地位的女教師。

相對地，商家擁有傳統的生產工具與資本，未如舊士族家庭重視教育。因此，未進入女學校，欠缺學歷、資格的孝子，在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變動中離鄉至都市謀生時，淪為中下階層、勞動者。移動至殖民地後，未能和鏡子一樣，擁有穩定、體面或是需要特定技能的職業，渡台之初的一年半，擔任植物園標本館的助手，「日薪」的所得形態和生活水準都較接近中下勞動階層。這樣的狀態持續至丈夫渡台後，在官廳覓得一職。

從地方到都市、走入家庭、從都市到殖民地，鏡子和孝子在移動的過程中，各自歷經「舊士族／新中間層」，「舊中間層／中下勞動階層／新中間層」的社會階層流動。

＜「新中間層」的形成與殖民地社會＞

若檢視圍繞著這兩位女性的親族，其求職的過程以及職業的性質，將浮現殖民地「新中間層」形成的樣態，及其與殖民地社會之間的關係。

鏡子的丈夫壯吉透過鏡子在臺灣擔任憲兵隊長的兄長，及其延伸的縣人會網絡，至專賣局臺北菸草工廠擔任雇員。孝子的丈夫保正、妹夫高橋堅吉，亦透過親人及其延伸的人際網絡，覓得總督府雇員的職位。其中，堅吉在專賣局的地方支局之間輾轉調任，1943年更擔任臺南支局長。

不同於日本本土因工業化、商業化及都市化等內在結構所形成的「新中間層」，隨著殖民地台灣的領有，因應統治所需的大量吏員，以及官僚體制下非正式僱用的縫隙，成為殖民地在臺日人「新中間層」形成的重要途徑之一，尾崎及兩個高橋家的例子正呈顯了此一樣貌。

同時，殖民地社會的權力結構，都使得兩家的社會階層高於在日本本土之時。尾崎家從都市中的「洋服細民」，轉變為領官廳薪水、過著穩定生活、不折不扣的「新中間層」。高橋家則從日本本土的「失業者」「浪人」，在殖民地獲得穩定的工作，並成為在臺日人社會中的活躍份子。

另一方面，儘管鏡子與孝子擁有親族、職場、婦人團體、教化或文藝社群等多重的生活圈與人際網絡，但無論是居住區或生活圈，都傾向於在臺日人都市中間層的社群，未與臺灣人的生活圈有太多交集，與臺灣人的私交、接觸不多。在台日本人中間層與在地社會之間存在了一道界線。

＜自我實現的場域＞

除了家族的社會地位向上流動，鏡子和孝子還擁有一個共同的特色，亦即，兩位女性皆在殖民地獲得「翻身」的機會與舞台。

鏡子積極參與以高官夫人為中心所組成的婦人修養團體，並活躍於社會教化活動，透過這些活動的參與，獲得在日本本土無法企及的機會與自我實現。孝子雖不熱衷於官製婦女團體，卻自由揮灑地組成與家計相關的婦女會。同時，參與短歌社團，出版歌集，自此展開職業寫作生涯。儘管兩人的方向大不相同，但卻都獲得了自我實現的場域。若分析其背後的要素，以鏡子而言，是獲得了可以接近權力中心的機會與場域；以孝子而言，是獲得了可以逃脫各種束縛、逸脫傳統秩序的場域。這兩個看似完全相反的要素，卻是共同源自於一個相同的磁場——日本帝國空間中殖民地的邊陲位置。

此外，殖民地的權力結構提供日本人較日本本土優渥的生活條件與經濟條件，這也是鏡子和孝子在越境後有餘裕實踐自己的夢想的結構性因素。另一方面，正因為身為「中間層」，不滿足於現狀，潛在的翻身欲望，是鏡子與孝子共同擁有的個人內在因素。

結語

鏡子和孝子各自象徵了兩種截然不同的中間層女性移動類型——移動背後的動能、在殖民地的舉措，以及與國家的關係，恰恰處於兩極的位置。另一方面，卻又存在著結構的共通性——殖民地皆是施展自我、社會階層向上移動的場域。儘管鏡子和孝子在經歷上顯得很特殊，但他們都不是特例，在同一時代，存在著不少與她們相似的身影。

這些女性移動的軌跡，一方面顯示日本帝國的擴張，提供日本不同群體中的「邊緣者」向外尋找機會的空間，另一方面，則交織出 1920 年代中間層日本女性向外移動複雜、多樣的動力與圖像。並且，呈顯日本本土的思潮如何藉由移動，在「邊境」之地發酵、實踐，甚至，透過女性的主體性產生變化。而她們言論、想法如何透過殖民地的台灣女性流通、再現、實踐或者變形，則是未來的課題。